

試論苏錫地区农业发展与中小城鎮的关系*

嚴重敏 刘君德 孙大文 盧奇达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

城市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产物,社会劳动分工的結果。它的形成、发展受社会經濟規律所制約。因此城市的发展特点、分布規律、内部結構以及城市間、城乡間的关系皆反映着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性質。

城市出現于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奴隶社会初期,并随着封建社会,特别是資本主义經濟的发展,大工业的兴起,商业和运输业的发展而飞速成长,同时亦加深了城乡間的对立。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才可能根本改变这种对立关系。

近几十年来,各国地理科学工作者,从不同角度对城市进行研究。但就影响城市兴起、发展的因素或城市的职能等問題而論,过去以探討非农业經濟部門和非生产部門与城市的关系較多;因为考虑到:“城市是与农业沒有直接联系的居民集中点。城市是依靠那些从农村經濟分出的非农业經濟部門——工业(包括手工业在內)、商业和运输业而成长起来的;但是它們同样也是依靠非生产部門——行政部門、軍事部門和文化部門(就这些概念的广义而言)而成长起来的”¹⁾。

但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虽然工业的发展往往是城市发展的主导因素,而其基础則是农业的发展。因而,研究城市发展除了考虑它和工业的关系外,还应加强它与农业关系的研究。笔者认为忽視农业与城市的关系,和忽視工业、商业、运输业与城市的关系一样,将影响更好地認識城市发展变化的規律性,也会使城市建設和发展导向脱离以农业为基础的傾向。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們,农业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馬克思曾指出:“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²⁾。要闡明作为社会經濟現象的城市形成发展的實質,同样必須遵循这些伟大的原理。沒有农业的发展,在古代,就沒有多余的劳力从事手工业而促使城市的产生,在现代,就不可能发展工业、商业、运输业以及非生产部門而使城市賴以兴起和发展;城市人口所需的基本生活資料——糧食、副食品以及部分衣着皆仰賴于农业……。凡此种种,足以說明城市的形成发展离不开农业。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平和特点,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城市分布的密度、城市的职能和規模。这种影响作用有直接的、有通过其他条件才显示出来的,甚至在表象上看不到这种影响,而實質上又和农业基础密切相联系。这种复杂的关系必須具体分析、全面評述。

不同社会制度下,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有着本質的區別。在前資本主义和資本主义社

* 本文撰写过程中蒙李春芬先生热心关怀和指导;在苏錫地区調查时,杭州大学王嗣均同志共同参加了一段工作;林莉莉、刘永瑜同志协助附图的清繪工作,在此一并志謝。

1) H. H. 巴朗斯基: 經濟地理学論文集,第156頁,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2) 馬克思: 資本論,第三卷,第1025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会里,城市通过对农村的剥削而成长发展,两者处于对立的地位。只有在人民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城市承担着支援乡村和农业的重任,根本改变了城乡对立的剥削关系,同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果对城市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的这一客观规律认识不足,体会不深,而将城市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的考虑离开了农业生产的水平,也会给农业和城市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为了使城市能更好地支援农业,促使我国农业早日实现现代化,具体地分析城市与农业的关系,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重视农业与城市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非农业部门和非生产部门对城市的影响作用。城市是地区经济的集中点,它的形成发展、地区分布和结构特点无疑地是自然、社会经济、历史条件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因此,在论证城市形成发展及其特点时,必须综合分析各方面的影响作用,同时亦应注意某一部门(或条件)对某一城市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中的主导作用。根据这些主导因素在城市职能中的地位,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城市分类:其中最多的是工业城市,还有矿业城市、交通运输城市、文化政治城市等。城市愈大,经济联系愈复杂,农业与城市的关系,往往由于其他生产部门或非生产部门的影响作用的牵制,表现不如中小城镇直接、明显¹⁾。但实质上农业与大城市仍有密切的内在联系。除上述城市人口基本生活资料依赖于农业外,如一国、一地区城市规模扩大超越于农业生产水平,过多的吸引农业人口转向城市,一定阶段内会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反之,又会制约城市工商业的繁荣。为此,忽视了任何一个方面的作用,都会影响对城市发展变化规律的全面了解。

为了探索农业发展与城镇间的关系,现根据对苏锡地区所了解的资料²⁾,以中小城镇为例³⁾,仅就农业发展与中小城镇间的关系作以下三方面的探讨。至于其他生产及非生产部门与城镇间的关系,因限于篇幅,不在此一一论述。

(一) 农业发展与中小城镇形成、发展的关系

从我国城镇的形成发展史来看,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势力入侵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期里,由于各时期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市的分布也十分不平衡。西汉时代,全国二十个比较著名的城市,主要分布在关中、三河、燕赵、齐鲁等地区,即集中在农业经济最发达的黄河中下游一带。东汉时期,随着南方地区的逐渐开发,北方人口有逐渐南移的趋势。但

1) 本文中的“城镇”,是指常住人口在2000人以上,居民50%以上是非农业人口的居民区(工矿企业、铁路站、中等以上学校的所在地和职工住宅区等,常住人口虽不足2000人,但在1000人以上,而非农业人口超过75%的地区)。城镇又可以再区分为城市和集镇。凡中央直辖市、省辖市都列为城市,常住人口在2万人以上的县以上人民委员会所在地和工商业地区也可以列为城市,其他地区都列为集镇。

关于“城镇”标准各国皆不一致。即在一个国家中,不同时期内,亦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或人口数量等情况进行调整。如我国于1963年12月份起,市镇建制的标准已有新的规定。本文所引用资料系于1963年5、6月份间调查,因此仍沿用上述标准。

凡包括“城市”和“集镇”在内的,本文称为城镇。2000人以下的小市集称为农村“集镇”。

2) 本文所谓苏锡地区,在行政上乃指江苏省苏州专署所辖的江阴、无锡、沙洲、吴县、吴江、昆山、太仓、常熟等八县,以及苏州市和无锡市。

3) 关于城市规模等级的划分各国颇不一致。我国城市按人口规模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特大城市: 100万以上的人口,大城市: 50—100万人口,中等城市: 10—50万人口,小城市: 10万人口以下。(引自高等学校用书: 城乡规划上册,中国工业出版社,第68页)

在全国范围内,北方黄河流域仍然是经济重心,大部分人口还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大城市仍以这一地区为主。

魏晋南北朝时,随着政治中心逐渐南移,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带来先进的耕作技术,在南方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江南主要在南通、常熟、苏州以西的地区),发展了农业生产。隋唐至北宋时期,又进一步整治了水系,修建了海塘,发展了灌溉和航运,从而使太湖流域“蓄洩有时”,“沿海之地,尽成沃野”。唐时江南已开始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当时韩愈曾谓:“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什九”。在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发展了副业、手工业和商业,因此有“盐税鱼盐,衣食半天下”之称。

明清时代,江南不仅为全国重要粮食基地之一,经济作物亦有很大的发展。明万历年间,长江口附近沿海地区,已发展成为重要棉区。其他如茶、麻等经济作物,也都在丘陵地区广泛种植。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引起了手工业、商业蒸蒸日上,各地的缫丝、织绸、织布、制茶、瓷器、制盐、铜器等均有较高的技术水平。自明成祖永乐年间郑和由苏州刘家河口出发下“西洋”以后,各国商贾往来通商愈多,对外贸易亦得到进一步发展。城镇的数目和规模都有了扩展。当时,南京、苏州、松江、镇江、常州、扬州、嘉兴、湖州、蕪湖、九江等地,均是商贾和手工业者聚集的头二等城市。其中松江地区(包括上海),自明代中叶以后,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工业中心,南京、苏州、杭州则是全国最大的纺织业中心。在鸦片战争以前,苏松地区(今上海所属十县)形成的城镇大小不等共约二百五十余个¹⁾。虽然这些城镇的产生和形成还有其他各种因素,如政治、军事、交通位置等,但大部分是依赖农业的发展,农产品集散交换的加强而形成的工商业综合性城市。

农业发展对地区城镇兴起和发展的关系,不仅在历史上如此,现代城镇亦同样受其制约作用,长江三角洲城镇分布较密,规模较大,一方面与近代工商业交通发达有关,同时又与整个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密切相联系。直接反映在城镇经济活动中的商业、运输、农产品加工工业和支援农业的工业部门的规模,亦影响了城镇的规模。如作为粮食基地之一的苏锡地区,今后要求在稳定高产方面起样板作用,农业发展就向城镇工业提出供应高质量多的化肥、农药和农机的要求。仅就化肥而论,解放前苏锡地区没有化肥工业,解放后发展了一些小型的化肥厂。但现从工业本身的经济核算和支援农业的需要考虑,小型化肥厂已不能适应新的农业生产的要求,需要建立几个规模较大的化肥厂。随着工厂的建立和规模的扩大,城镇的规模和职能结构亦相应地发生变化。类此例证,不胜枚举。所以认为城镇的成长不依靠农业经济部门,这种论断是不符合实际的。

从历史上分析,苏锡地区农业对中小城镇兴起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为便于说明起见,一般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 由农村交换市集发展形成为固定的集镇:

由于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生活、生产的需要,在交通要冲地区逐渐由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市集形成为固定的集镇,并承担供应农村所需的小百货、小农具等的任务,起着大城市和农村中的桥梁作用。这类城镇一般规模不大,往往拥有二、三千人口,视其商业上吸引的范围大小、地区的人口密度、集镇本身的发展水平等条件而异。在职能上具

1) i 转引自杜黎:“鸦片战争前苏松地区棉纺织业生产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学术月刊,1963年,第3期。

ii 该文所指城镇概念与目前规定不完全一致,包括部分农村“集镇”在内。

有综合性的特点,它往往是小区域范围内政治(如现为公社办公地点,过去为乡政府的所在地)、商业、食品加工工业(如粮食加工、酒酱业等)以及文化(初级中学、小学、娱乐场所等)的中心。在商业上除综合性百货店较多外,仍保持有集镇形成初期定期市集的特色,但逐渐转变以早市为农副产品交换最活跃的时间,八时以后反趋冷清,与大中城市的商业活动时间显然不同。

江南水网地区的农村市集,一般三、五里即有一小市集。据常熟县 1962 年统计,全县拥有 500—600 人口规模的农村小“集镇”达 60 个之多,而 2000 人以上的集镇全县仅七个(图 1)。究其原因,这一地区农产品(如棉、粮)商品率都较高,且较稳定,加以花边等农村手工业较发达,相对说来,农村经济和交换较活跃,从而兴起了众多的农村“集镇”。至于农村“集镇”能否进一步向城镇发展,本区的情况是往往与其所在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交通方便,经济联系范围广,有可能促使它们进一步发展。再则还受到政治、工业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就常熟县而论,七大镇的交通位置都较优越。如虞山镇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亦是内河航运的中心,与沪、苏(州)、锡(无锡)、澄(澄江镇)及四乡各重要集镇之间,每日均有小轮往返,公路可直达沪、苏、锡及十一圩港。浒浦镇、福山镇曾一度为长江沿岸的港口,以前苏北各县至常熟贸易的船只多停泊于此,现因港口淤浅而成为渔港。此外如梅李镇位于浒浦塘与盐铁塘交会之处;支塘镇位于白茆塘与盐铁塘二大干河的交点,并有公路与上海、常熟相通,唐市镇是常熟中部与西部地区至上海的必经之地。有利的交通条件,不仅使这些市镇为附近工农产品交易的商业据点,并起着大中城市与农村间工农产品贸易的转运或桥梁作用;活跃了地区经济,支援了农业生产,同时亦扩大了城镇的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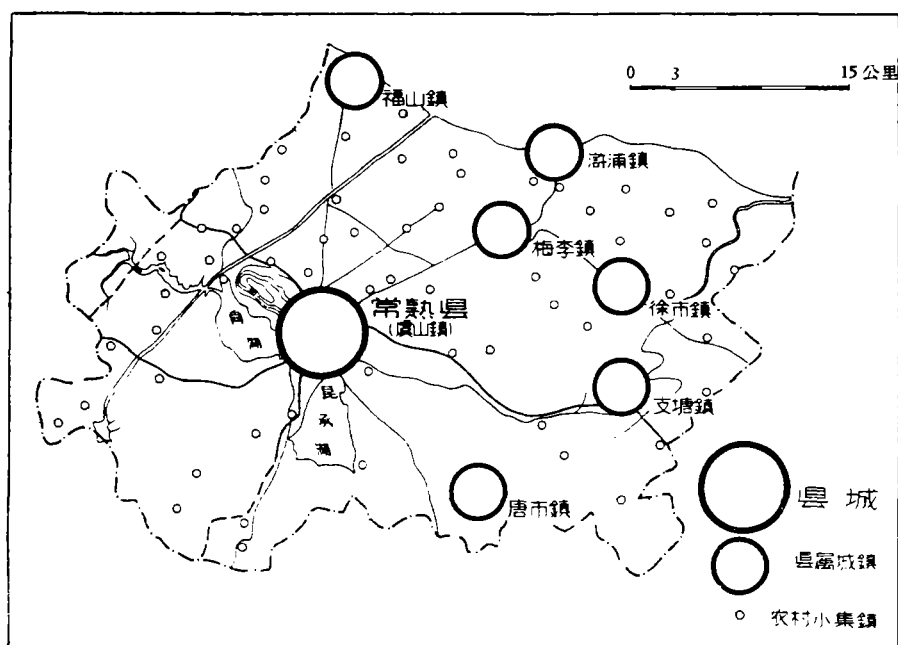


图 1 常熟县城镇与农村集镇分布图

2. 由于某一农产品大量集散轉运而促使城镇的发展:

这类城镇兴起原因基本与上述类同,但一般多分布在这类农产品生产专门化程度高、商品性强的地区。城镇职能特色、规模大小与该农产品有密切联系,在其发展初期尤为明显。

苏锡地区历来为我国商品粮的基地。因此不少城镇的兴起与稻米有关。如吴江的同里镇、黎里镇,吴县的木渎镇,太仓的双凤镇,无锡的甘露镇,昆山的茜墩镇等,早期的经济活动主要围绕着稻米。过去,这里有封建地主租米征收处,亦有经营中间买卖的米行,供应本镇或邻近居民食用的米店、米摊和粮食加工厂,甚至典当业的受押物资中亦有稻米一项。肩担步挑、船载车运的稻米运输活跃起来,相应的茶、旅、酒馆等生活服务行业的兴起,亦就促使了城镇的兴起和发展。这类拥有二、三千人口的小集镇在粮食交换活跃时期,米商从业人员就可达城镇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

苏锡地区的米业活动不仅影响小城镇的发展,亦促进中等城市——苏州市、无锡市的进一步繁荣。苏州市郊枫桥的米市过去十分有名,而无锡市则曾被誉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

早在西汉初年无锡已建县,虽数易其名和隶属关系,但仍不失为封建社会的政治中心。其商业资本的发展系建立在粮食、蚕桑和农村手工纺织业的基础上。发展最早的首推粮食交易活动。先在城乡边缘地区,如北门外通汇桥榭巷、三里桥塘岸及南门黄泥埭等处。随着太湖水利的整修、大运河的开凿,为无锡粮食交易、集散、轉运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原在城乡边缘地区经营的粮食交易活动顺运河沿岸的三里桥西塘一带固定下来,并兴起了众多代客买卖的粮行。清乾隆 17 年(1752 年)迴谷氏所著的“锡金识小录”中即有描述当时无锡米市的盛况。可见无锡粮食商业活动早在几百年前业已形成。

而后因黄河泛滥、运河航行受阻及北方兵灾等原因,漕粮地区减少,转而主要依赖江、浙两省,清光绪 14 年(1888)并定无锡为江苏各县漕粮轉运站,当时由无锡調运的漕粮年约 100 万石,促使无锡粮食商业活动的进一步发展。除经办漕粮外,原产粮地两湖、安徽、江西等地自停止漕粮征实之后,地主阶级欲将粮食抛售,其时上海等城市人口增加幅度较大,商品粮需要日增,无锡距上海等大城市近,并拥有必要的储存粮食或加工粮食的设备,同时又盛产丝茧布帛,客商抛售粮食后可就地购买手工业产品,因此邻省客商皆乐于至无锡售卖粮食。随着粮食吞吐量的不断增加,销售地区的扩大,加以客商储汇资金、堆存实物、加工粮食等的需要,钱庄、堆栈、粮食加工工业等行业日益发展;其他服务性行业如客栈、茶馆、酒楼、戏院、浴室等亦蒸蒸日上。无锡仅代客买卖的中间粮行,宣统年间已达 140 余户之多,不愧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因此人们认为:粮食行业为无锡百业之首,是无锡各业发展的动力¹⁾。迄今无锡港每年粮食进出口量仍然很大。苏州港由于专署所在地,調运更形频繁。

3. 在农业基础上发展某种手工业和工业为主要职能的城镇:

这类城镇往往出现在各种经济作物地区。如棉产区兴起的手工纺织和现代纺织工业;甘蔗、甜菜产区出现的制糖工业中心;林区的木材加工工业或造纸工业等皆是。在苏锡地区由农业基础上发展成为手工业、工业的城市亦不乏其例。兹以由蚕桑产区发展

1) 資料及引語轉引自无锡市粮食局十年史工作组編:“无锡粮食商业的发生、发展和改造”(油印本)。

手工織綢和現代絲織工業的盛澤鎮為例，說明其對城鎮發展的重要意義。

盛澤鎮位於江蘇省吳江縣東南端，南距浙江僅 3.5 公里。地處江南水網地區，地少人多，以圩田為主。歷來農民利用圩田堤埂及局部高丘進行種桑養蠶，以補農田收入之不足，就桑葉產量論，盛澤周圍各鄉所占比重頗高。在蠶桑種植的基礎上，發展了一家一戶的土綢手工紡織業，盛澤適處交通便捷的蠶桑土綢產區，逐漸形成為土綢的集散和生產的中心。據盛湖志記載：明嘉靖年間盛澤始成為市。居民百家，以綢綾為業，其後商賈輻輳，煙火萬家。盛湖雜錄：“環鎮四、五十里間，居民皆以綢綾為主，凡邑中所產者悉薈萃於盛澤，天下衣被賴之。清乾嘉間，遠商鱗集，粵、閩、滇、黔、輦金至者無虛日，以致會館、旅邸、歌樓、舞榭、繁阜宣盛如一都會焉”。以上描述足以說明盛澤成為城鎮及其以後的發展，皆與蠶絲、土綢密切不可分割。

盛澤成為絲綢集散中心的同时，發展了土綢的紡織業，並隨著生產技術和設備的提高，成為蘇南重要機械絲綢業的中心之一。據 1953 年調查，全鎮 5932 戶中，直接從事土綢生產的達 894 戶。為土綢服務的行業，計有鋼扣、梭子、紆子、小木作、天練、軸紡、綢紡等 15 種行業，占全鎮商業手工業總戶的 24.2%。機械絲綢尚未計入在內，足見盛澤鎮的經濟活動與蠶桑絲綢業息息相關。

蠶桑因抗戰時期被日帝破壞尚未恢復，絲綢生產大受影響。但 1962 年絲織工業的產值仍占全鎮工業產值的 69%，紡織工業從業人數占全鎮職工人數的 82%，居全國絲織工業第四位。

蠶桑事業的盛衰對蘇錫地區其他城鎮如無錫市、蘇州市、震澤鎮的發展影響亦較大，茲不一一列舉。

（二）農業生產對中小城鎮分布的影響

城鎮的分布密度和特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地區自然條件特點和經濟發展水平，亦反映着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特點和水平。從蘇錫地區城鎮分布情況來看，亦可說明這一關係。蘇錫地區的城鎮分布的主要特點是：

1. 城鎮數目多、規模不大，分布比較均勻：

本區共有中小城鎮 61 個，平均每縣擁有 7—8 個 2,000 人以上之城鎮（圖 2）。各城鎮之間距離近，一般多在 12 公里之內，部分城鎮間的距離僅 6—7 公里，少數超過 20 公里；每一城鎮吸引半徑 3—5 公里或 6—7 公里不等，四鄉至鄰近城鎮，無論搭車、乘舟或步行，皆能在半日或 1 日內往返。相對說來，城鎮分布比較平均。

本區城鎮數目雖多，但規模不大，除蘇州市和無錫市外，其餘多是 10 萬人以下的小城市，而尤以 3,000—5,000 人左右的集鎮占多數。除無錫、沙洲兩縣外，各縣皆有一個擁有萬人以上之較大集鎮，其中大部分是該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如江陰縣的澄江鎮、常熟縣的虞山鎮、太倉縣的城廂鎮和崑山縣的玉山鎮；但亦有非政治中心的較大城鎮，如吳江縣的盛澤鎮、吳縣的澹臺關鎮即是。

2. 所有城鎮皆位於通航河湖沿岸或鄰近之處：

全區所有城鎮幾无一例外地分布于沿江、沿河或湖蕩附近（圖 3）。每一城鎮皆有 1—2 條通航的河道可以深入各地農村。其中以具有區間經濟聯繫意義的江南運河、錫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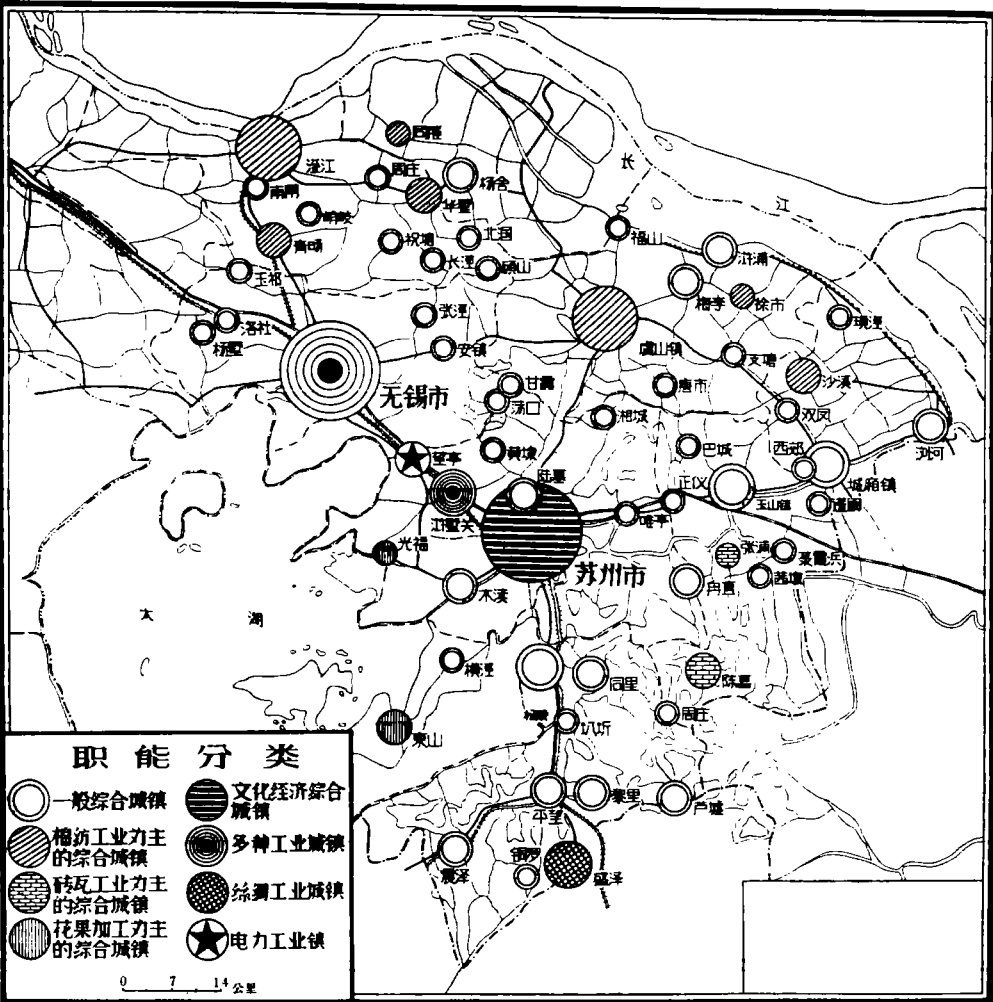


图 2 苏锡地区城镇规模、职能分类示意图

运河、苏州塘、吴淞江等沿岸兴起的城镇特多，规模亦较大。如以江南运河而论，流经本区一百多公里间，沿岸即有洛社镇、无锡市、望亭镇、浒墅关镇、苏州市、松陵镇、圻圻镇、平望镇、震泽镇等九个较大的市镇。

各镇具体地理位置颇不一致，有的处于数河汇集处，如苏州市（有江南运河、苏州塘、吴淞江等）、无锡市（有江南运河、锡澄运河、伯渎河等）；有的位于两河相会点，如太仓城廂镇（浏河与盐铁塘交会处）；有的位于江岸河口处，如浒浦镇（梅塘入长江处）、澄江镇（锡澄运河通长江处）；有的位于河湖之间，如平望镇（江南运河与鸳鸯湖）、荡口镇（伯渎河与鹅真湖）；亦有的城镇处于羣湖之中，如周庄镇、芦墟镇。这些分布特点说明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水路交通是支持本区城镇的脉絡，构成城乡的通道，亦是本区城镇兴起的一个具体条件。

3. 在比较平均分布的基础上又有相对的地区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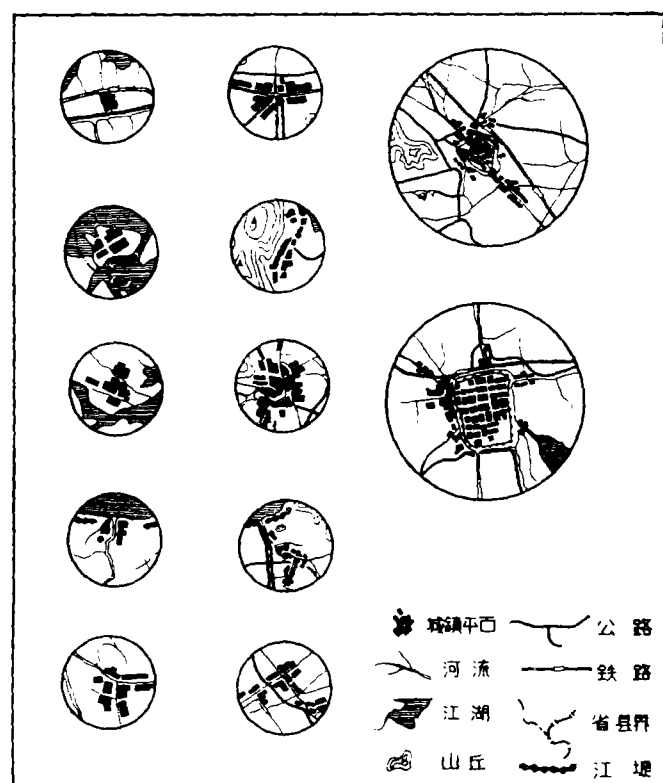


图3 苏锡地区城镇平面位置示意图

本区城镇分布比较平均,这是就整体看来的基本特点,但地区内部又有相对的差异。比较明显的有两种倾向:第一,较大城市四周城镇分布疏密的差异,如本区两个最大的城市——无锡市和苏州市,其邻近地区的城镇分布密度有着显著的不同。作为苏锡地区工商业中心的无锡市周围 15 公里间,除西南 12 公里运河沿岸的洛社镇外,皆为 2000 人以下的农村小“集镇”,出现了较大城市四周城镇较少的特点。常熟虞山镇附近亦有类似的情况。反之,苏州市周围 10—12 公里地区,则有陆墓、浒墅关、木渎及外跨塘等集镇。第二,城镇有向主要交通干线、不同农业生产类型的接触地带,和不同行政区接壤地带集中的趋向。苏锡地区城镇分布除上述向运河沿线集聚外,另一集中带表现在沪宁铁路沿线。集聚在这条线上的城镇人口占全区城镇人口的 87%。主要有无锡市、苏州市、望亭镇、浒墅关镇、玉山镇等九个城镇。另外相对集中的地带还有沿江棉花水稻区与中部水稻区之间,除沙洲北部因江岸涨坍变迁而城镇较少外,其余接触带上城镇分布相对地较多,并具有一定的规模。此外,不同行政区接壤的地带如吴县、吴江与昆山的交界处即集中了巴城、正仪、角直、陈墓、周庄、芦墟等镇。

形成上述城镇分布的特点,是自然、社会经济、历史条件综合影响的结果,如大运河的开辟、沪宁铁路的修建、明清以来商业、手工业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现代工业的出现等等,都对本区城镇分布的特点、规模起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虽然如此,农业生产对本区城镇分布的影响仍不容忽视。就目前城镇分布特点而论,与农业直接或间

接有关的,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 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和特点影响地区城镇分布的基本面貌:

苏锡地区向以粮食生产著称,农业在工农业产值中所占比重较高,人口稠密,其中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6%,平均每一农业人口和劳动力所拥有的耕地都较少,劳动力充裕,有利于精耕细作。肥料来源较广,养猪数量亦较多。1958年以前,全区平均每亩施肥费用约为13元,超过江苏省平均数字1.3倍之多。农田水利建设原有一定基础,解放后发展更快,1962年全区机电灌溉面积达到耕地总面积的90%左右。因此农业生产水平较高,1962年各县水稻每市亩单产平均在500斤上下,各种农产品商品率均较高。此外有丰富的水产、著名的桑、茶、水果等产品。农副产品的丰富多样和较高商品化程度,必然引起产品的交换、转运,要求有一定数目的城镇来承担物资交流的场所,并有一部分人口从事农业以外的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的活动,促使城镇的发展。苏锡地区不仅城镇数目较多,城镇人口比重也较高(与我国其他地区相对来说),占总人口24%,这亦与本区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密切相联系。

另一方面,苏锡地区的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属于小农经济,以人工劳动为主,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这些方面受到一定限制。因此不论所提供的商品性农产品的数量,或对农业生产资料的需要量等,都不能普遍大量地集中进行交换。同时在小农经济及地区农业生产特点影响下,形成的乡村居民点散居多,集村少,更使乡村物资交流带有分散性。为了适应这种农业生产基础的需要,客观要求城镇分布比较分散。苏锡地区城镇分布的基本面貌可以说是本区农业生产长期影响的结果,反映出农业与城镇的内在联系。

2. 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特点是影响城乡交换和城镇产生的自然基础:

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和特点只能决定城镇分布规模的基本特点和一般趋势。对具体城镇来说,为什么它建立在这里而不兴起在那里,为什么它在这里会得到发展,在那里则不然,这一方面受到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同时与具体的地理位置、地区自然条件特点又有着密切的联系。

苏锡地区位于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水域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16%;南部各县比重尤大,如吴江县达24%。这些河流湖荡一般终年可以通航10吨以下的木帆船,主要干河且可通航小汽船,各河间息息相通,深入广大农村。本区农村物资比较分散,正适宜小船承运。因此区内的经济联系任务必然落在内河运输的肩上,1962年苏州专区水运货运量占货运总量80%。作为农村物资转运,集散中心的各类城镇,客观上要求其位于河运便捷的位置,所以本区大小城镇皆位于通航的江河、湖荡的沿岸或邻近地点。如城镇跨沿着河道航程长、会合河道多或具有区间联系的河道,其吸引范围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城镇发展,甚至直接影响它的规模。就城镇地理位置形态来看,苏锡地区的城镇有线状和块状两种。前者主要沿河道分布,所占数量特多;后者一部分是旧有政治中心,因围墙筑城而成块状形态,另一部分是临湖城镇。由此可见,本区大多数城镇的兴起与水路交通息息相关。

3. 城乡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是促使局部地区城镇分布差异的因素之一。

不少城镇的诞生,曾经过非城市性的小“集镇”阶段。在其从小到大,从小“集镇”向城镇发展过程中,它一方面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当城镇形成后,又会反过

来对农业和乡村起反作用,其作用性质视社会制度不同而异。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剥削对立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是支援协作的关系。不论两者关系如何,都会引起城市(特别是较大的城市)周围地区生产上和生活上的变化,影响邻近地区农业的布局、作物的结构,以及农业集约化水平的变化,从而会促进某些小集镇的兴起;但也不可能因大城市某些职能代替了小“集镇”的作用而影响后者进一步的发展。

大城市附近小“集镇”能否发展成为城镇,除视其本身所在的位置、地区农业发展水平以外,并取决于大城市对小“集镇”的联系和制约作用。

例如无锡市的工商业发展和交通位置的改善,扩大了吸引范围,加以城市较大,人多购买力强,拥有的商品种类多、质量高,因此邻近四乡农民的农副产品出售,日用百货或生产资料的采购,皆乐于趋向无锡市,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周围小“集镇”的发展。据对距无锡市东12公里处的梅村调查,由于距无锡市近,交通便(日有数班小汽船往返),四乡农民经此不停,工商业不易发展,故当地人称作“活地”(即不易发展工商业之意),迄今仍为2,000人以下的小集镇¹⁾。目前无锡市的规模是一个中等城市,而邻近小集镇又没有特殊优越的条件可作为本身的发展基础。在这几方面相互影响作用之下,出现无锡市周围城镇分布相对减少的特点。

反之,有的较大城市,如苏州市,向为政治文化中心,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一方面城市本身职能结构起了变化,但另一方面为了保持原有的文化游览地的特色,必然要求某些工业基地在邻近地区开辟,这样就向浒墅关、木渎、陆墓等地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这些城镇的繁荣。同时,这些城镇原有手工业基础和发展工业的资源条件等亦较好²⁾。在两方面相互影响作用下,出现了以苏州市为中心的城镇相对集中的地区。

4. 农业生产地域类型的差异,是影响城镇分布地区差异的另一因素。

除纯粹工矿业城市外,大部分城镇的兴起与物资交换、集散有关,特别是分布较广的小集镇。农业生产地域类型的差异,必然反映在各区农产品的种类、商品化程度以及农民收入水平等方面的不同,因此在不同农业生产地域类型的接触带上,在位置优越之处,比较容易兴起城镇。如苏锡地区的沿江棉花水稻区与中部水稻区之间城镇相对比较集中,这与不同农业生产类型间交换频繁,经济作物区农民收益高、需要调入部分粮食,经济作物商品率高,以及某些经济作物的加工需要发展工业等因素有关。

此外,在不同行政区接壤之处,由于两区某些种植习惯、自然条件以及对农产品收购价格等的差异,亦会出现频繁的物资交流,伴随而来的必然出现较多的城镇。且两区交界地带,一般离各县政治经济中心较远,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客观要求有一定的交换中心。同时,在旧社会里,这些交界地区封建反动把头,地主匪帮势力较大³⁾,这些城镇一方面成为他们对农村剥削的据点,另一方面为供其生活享受的需要,而造成城镇畸形的虚假繁

1) 梅村过去由于梅村中学学生人数多,而一度升为集镇,现因农村户口学生不计入城市居民,仍为农村“集镇”。

2) i 如木渎是吴县西部地区至苏州必经之地,历来手工业比较发达。曾为粮食集散中心之一。附近有发展陶瓷工业的原料,解放后在此建立了陶瓷工业。

ii 浒墅关原有蚕种试验场和蚕桑学校,并有石粉厂,故有一定基础。后曾划归苏州市管辖,并发展了某些工业部门。

3) 如具有七千多人口规模的陈墓镇,解放前有114户地主,工商业兼地主145户,反动党团、道会门以及匪帮组织达76个组织之多。

荣。在苏锡地区吴县、吴江与昆山交界处即集中了巴城、正仪、甪直、陈墓、周庄、芦墟等镇。

以上仅就苏锡地区中小城镇分布与农业直接或间接有关的情况作初步分析。实际上影响城镇分布的具体因素比上述多,如矿产资源、地区开发历史,对某一城镇分布都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必须就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的城镇进行具体分析。

(三) 农业发展与中小城镇职能的关系

地区城镇职能特点不仅反映地区经济的特色,并能借以窥视城乡关系及整个社会制度的性质。解放前我国大部分城镇属于消费性。表现在城镇内部结构上,商业和服务性行业比重大,剥削城乡劳动人民的典当业几乎每个城镇都有,而现代工业却十分薄弱,机械工业尤为落后。解放后我国城镇起了根本的质的变化,特别是公社化之后,作为行政职能体现者的社会主义城镇,大部分是经济领导的中心。随着工业的发展,纯粹消费性的城市已告消灭,城乡间、工农业间的关系更趋密切。当然,长期小农经济影响下的某些特点,还不可能在短暂的十几年中完全消失。

就苏锡地区 61 个城镇现有内部结构特点来看¹⁾,大致可分为九种不同的职能[参见图 2]。这些职能特点一方面反映着地区经济特点,同时又为地区经济的发展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彼此有所区别,亦有共同的作用。其与农业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1. 所有城镇全是各级行政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多具有综合性职能的特点。有的是公社所在地,有的是县的政治中心,苏州市则是市、县(吴县)、专署(苏州专署)三级政治中心。无锡市除设市外,并为无锡县县治所在地。同时根据城镇规模的不同,又是各级学校和卫生医疗机构的集中地区,因此居民中从事行政机关、文教卫生等工作的比重较高。在商业上,零售、批发、农副产品采购等部门都有,一般亦是中心或基层供销社的所在地。特别是十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商业主要直接为广大农村服务,集市性质的早市贸易,是一日中交换买卖最活跃的时刻。工业一般以粮食加工、农业机械为主,旧式的酒酱业,以及适应农业生产需要的铁木竹手工业仍保有一定的地位。亦有某些为生活服务或大工业服务的生产部门²⁾。并有一些著名的特种手工业部门,如苏州的刺绣,常熟的花边。但主要经济活动多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因此农业生产活动的季节变化,农业收获的丰歉,十分明显地直接反映到整个城镇的生产和非生产部门的活动,即直接反映在商业营业额的高低,淡旺季的变化,工业原料供应的余缺对开工率的影响,运输物资的多少³⁾,甚至反映在书场戏院的上座率。

与此同时,可以看到城镇对广大农村在供应生活和生产资料,组织、调拨农副产品的交换,以及承担文教卫生方面的任务⁴⁾等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供销部门除根据

1) 根据城镇居民从业人员,及其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作用而划分。

2) i 为生活服务的除缝纫、制鞋等手工业部门外,还有利用废棉絮纺织绒毯等。

ii 本区为大工业服务的工业部门亦有一定数量,如玉山、支塘、虞山、澄江的化学工业,甪直的镜片厂,宝素珠厂、陆墓的石棉厂等产品,主要供应上海市工业或生活所需。

3) 以苏州港 1962 年物资吞吐量为例,全年各月运量吨位以一季度及四季度后二个月为最高,比 6—10 月份高出 30—70%,反映秋收后农产品调拨量增加及农村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购买力增强的结果。

4) 据了解,一般城镇中的中学生 70%来自邻近农村,30%为本镇居民。

地区农业生产特点, 组织供应各种生产资料外, 往往还按农业生产季节及时与公社、生产队联系, 催购化肥、农药, 协助解决农业生产资金周转, 避免耽误农时, 就从这一方面而论, 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城镇支援农业的作用。

2. 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和农业机械工业在各级城镇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图4)。就工业部门论, 碾米是本区旧有的主要工业部门, 发展历史早, 分布地区广, 几乎所有城镇皆有一、二家大小规模不等的碾米工业, 为当地人民口粮及商品粮加工。无锡市是全区最大的粮食加工工业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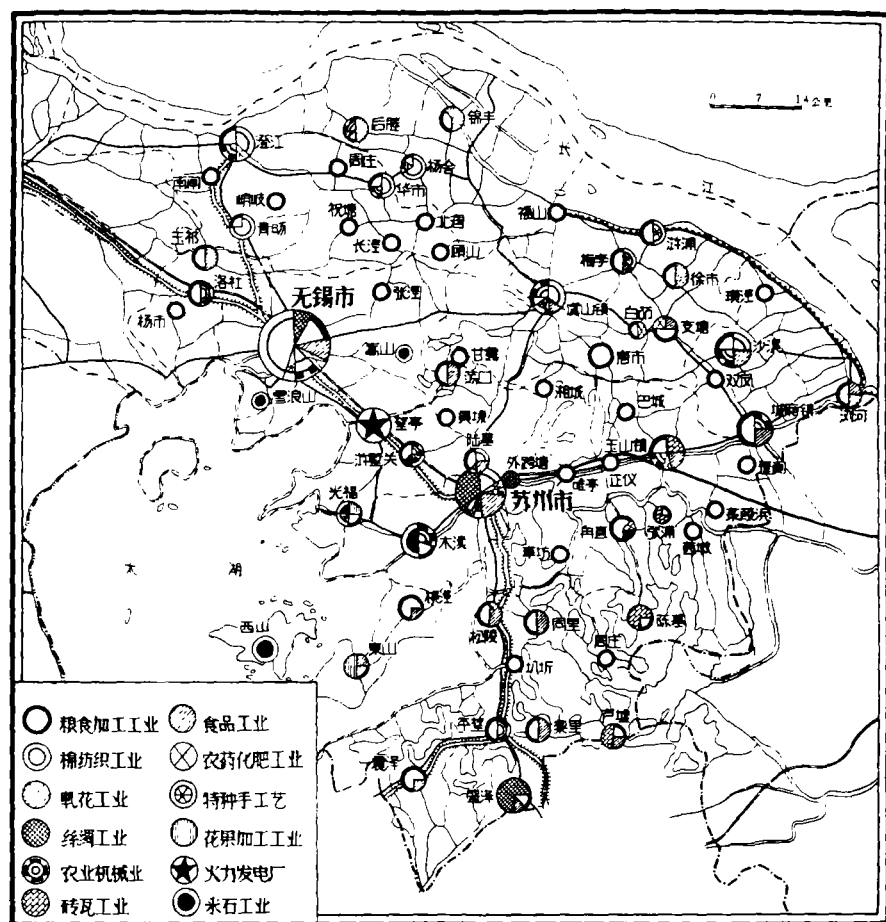


图4 苏锡地区农副产品、农机、化肥等工业分布示意图

除粮食加工工业外, 在农业基础上形成的加工工业, 本区有棉纺织工业(分布在澄江镇、沙溪镇、虞山镇及苏州、无锡两市), 轧花工业、丝绸工业(无锡市、苏州市、盛泽镇), 花果加工工业(东山镇、光福镇)以及酒酱业等, 是构成本区各城镇工业的主要部门。苏州专区1949年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值, 占工业总产值90.36%, 随着整个工业的发展, 至1960年这部分工业产值比1949年增加四倍多, 其相对比重虽有所下降, 但仍占61.74%, 足见本区工业与农业间关系的密切。

随着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和重工业部门的建立, 初步形成了以修配为主的农业机械

工业网。无锡市是本区最大农业机械制造中心,除此以外,苏州市及各县皆有一个较大的农业机械中心,承担着维修及部分制造任务。各城镇都有一定的修配设备,如江阴县除 2 家规模略大的农机厂外,全县各公社共设立了 67 家农具修配厂,基本能就地解决机电灌溉机械的维修和小农具的生产任务。

此外,还有为城乡人民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电力工业、建筑材料工业等部门。各城镇直接支援农业的工业部门,不论产值或比重逐年皆有增加。1952 年苏州专区支援农业的工业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 4.23%,1960 年则上升至 8.57%¹⁾。

总之,根据苏锡地区城镇职能特点来看,以综合性职能居多。这类城镇形成发展过程受地区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制约很大,形成后的职能又与地区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纯粹工业城市为数不多,即使工业比重较大的无锡市、苏州市、盛泽、沙溪等城镇,也是从农产品加工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无锡市,近代工业发展水平较高,但与农业有关部门的产值仍在工业总产值中占优势,达 62.6%。至于其他一些部门,亦未尝不与农业有间接的关系。

由此可见,简单地认为城市都是依靠非农业经济部门或非生产部门而成长起来,是不够完善的。我们认为,城市是农业生产发展、社会分工加强的产物,是具有一定规模的非农业人口占优势的居民集中点。它是依靠地区农业及其本身非农业(主要是工业,而工业又必需以农业为基础)或非生产部门的发展而成长。

了解农业与城镇的关系,目的在于使城镇更好地为农业服务。在我国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总的来说,城乡间、工农业间的关系是相互支援,相互促进的。并为加强城乡结合,工农结合,为逐步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创造条件。但是由于对城镇发展归根到底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根本问题认识不足,有时会出现对城镇发展规模控制不严,城市建设要求偏高,城市的生产部门或非生产部门面向农村考虑不多等现象,从而会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为了避免这类问题的出现,使城镇更好地支援农业,我们认为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工作:

首先,研究影响城市发展规模的因素,除了从工业以及其他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着手外,还应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城市调查,探索农业与城镇间关系,研究城镇发展规模如何与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寻求合理的比例关系,为我国城市发展的规模提供科学依据。

其次,在总结典型城镇支援农业的经验和问题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分析研究各个城市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内部结构、发展方向等问题,使城镇在支援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中作出贡献。

再次,应从合理配置生产要求出发,结合经济区划工作,研究不同地区城镇分布规律,为今后建立新城市作好准备。

(收稿日期: 1964 年 2 月)

1) 1962 年各市县支援农业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无锡市 7.1%, 江阴 6.4%, 吴县 8.2%, 无锡县 8.2%(1961 年), 沙洲 5.9%, 昆山 6.4%。

THE GROWTH OF CITIES AND TOWNS AS RELATED TO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SOOCHOW-WUSI DISTRICT

CHUNG-MIN YEN, J. T. LIU, D. W. SHAN AND G. D. LU

(The Normal University of Eastern China, Shanghai)

ABSTRACT

I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towns many geographers tend to emphasize non-agricultural activities, such as industry, commerce, and transport, and non-productive activities, such as administration and culture as the principal factors. But while these are related in varying degre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the importance of agriculture as a factor is not to be ignored. In this regard any generalization without taking agriculture into consideration is incomplete. As the necessities of life for urban population such as food grains, subsidiary foodstuffs and part of clothing materials are supplied by agriculture, without prosperous agriculture, there would not have been surplus manpower for manual industries in ancient times and would not be possible in modern tim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commerce, transport, and so no possibil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The level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ffect in a remarkable degree the size, functions and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cities. Some of the influences are direct; others become apparent only through some other factors; still others are not even observable although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agricultural foundations of the region concerned. The complexity of these relations calls for detailed analyses and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s.

In order to make clear the relations between cities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field findings, offers a case study of the urban communities in the Soochow-Wusi district. Accordingly, the analyses are made as follows:

1. The rela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the medium to small-sized cities and towns.
2. Their distribution patterns as influenced by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3. Their functions as related to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the cities of a region are in a large degree the products of the increas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further division of labour, although there reside in prominence a certain amount of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Their growth depend upon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ed region, and their own non-agricultural and non-productive development.